



2020年12月18日安全理事会主席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常驻代表的信

谨随函附上在2020年12月16日星期三就“秘安全理事会附属机构主席的通报”召开的视频会议上安全理事会关于索马里的第751(1992)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及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主席、比利时常驻代表菲利普·克里德尔卡大使；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1989(2011)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安全理事会第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及安全理事会第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印度尼西亚常驻代表迪安·特里安夏·钱宁大使；安全理事会第1718(2006)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德国常驻代表克里斯托夫·霍伊斯根大使；安全理事会关于利比亚的第1970(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德国常驻副代表京特·绍特尔大使；多米尼加共和国安全理事会事务特使、安全理事会关于马里的第2374(201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何塞·辛格·魏辛格大使；以及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特设工作组主席、南非常驻代表杰里·马修·马特基拉大使所作通报的副本。

根据2020年5月7日安全理事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常驻代表的信(S/2020/372)中所述、在冠状病毒病大流行造成的特殊情况下商定的程序，所附通报和发言将作为安全理事会正式文件分发。

安全理事会主席
杰里·马修斯·马特基拉(签名)



附件一

比利时常驻联合国代表菲利普·克里德尔卡以安全理事会关于索马里的第751(1992)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及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主席名义所作的发言

[原件: 法文]

最近几个月, 我有幸担任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主席、安全理事会关于索马里的第751(1992)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以及关于伊朗的第2231(2015)号决议执行工作协调人。

比利时有幸在这三个机构任职两年, 我感谢安理会让我有此机会, 在我们准备欢迎即将上任的新成员并向其移交任务之时, 就该项任务阐述我的看法。

担任第2231(2015)号决议执行工作的协调人是一项殊荣。在执行该项任务时, 首先, 我得以借鉴荷兰所做的杰出工作, 荷兰曾在比利时之前担任协调人; 其次, 依靠秘书处坚定不移的支持。

在我任职期间, 我的目标是代表安全理事会, 依照我的荷兰前任留下的三个指导方针, 支持和改善决议执行工作: 第一, 促进各方之间的对话; 第二, 我们的工作透明度; 以及第三, 促进供应链之内的贸易。

我们都知道《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和第2231(2015)号决议当前的困难处境: 美国退出、伊朗脱离接触, 以及美国对关于伊朗的第1737(2006)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各项决议所持的立场。在这些情况下, 比利时竭力在各方之间发挥诚实中间人作用。我相信, 保持框架完好无损可以为外交活动铺平道路。

在我离任之时, 我比以前更相信我们需要安理会共同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 而《行动计划》是这类重要应对措施之一, 也是核不扩散、对话和外交方面最成功的事例之一。它是多边主义、和平与国际安全的基石。因此, 我唯有鼓励全体会员国和区域及国际组织采取适当行动, 支持和加强其执行工作。

比利时还担任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主席。我在我的前任瑞典所做的工作基础上, 争取制订一项积极而且有抱负的工作计划。

持续损害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现象令人深感忧虑, 儿童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这令人无法接受, 因此, 我们负有紧急处理此事的共同责任。安全理事会的团结及其对工作组的任务给予的有力支持时常令人感到鼓舞。在过去两年里, 我们几乎就所有的国家局势通过了决议, 包括一直让安理会自身产生分歧的那些国家的局势, 例如缅甸和叙利亚。借助两份主席声明——2月份在比利时国王和王后出席会议时通过的S/PRST/2020/3, 以及9月份在尼日利亚担任安理会主席国期间通过的S/PRST/2020/8, 我们加强了对袭击学校行为的重视和调解进程中的儿童保护。

我们必须继续扩大工作组的影响力。仍然有必要在纽约和相关各国加紧跟进这些决议, 例如在双方大使馆的倡议之下。同样, 我认为, 工作组同国家工作队以及有关国家当局的直接接触应当得到保持和进一步发展。这同样适用于对一些国家的定期访问, 例如我们2019年对马里的访问, 也适用于提高民间社会的认识。我们还必须保持列名机制的完整性和公正性。

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的任务不仅仅限于工作组，安理会应继续将保护儿童作为其工作重点，确保联合国特派团具备专职能力，并在举行会议和访问各国期间强调保护儿童。

我感谢安理会全体成员致力于儿童与武装冲突方面的工作。我特别感谢比西尼娅·甘巴·德波特希特夫人尽心睿智领导下的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还有儿基会、和平行动部以及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感谢它们给予可贵的密切合作。它们共同代表着我所称道的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最佳表现。我稍后将通过安理会主席散发一份更详细的经验教训和建议综述。

最后，在过去两年里，我们看到与对索马里的制裁有关的进展。例如，部分解除对所马里当局实施的武器禁运之举已经延长期限。禁运条款已经厘清，并被整合到单独的第2551(2020)号决议中。此外，安理会还遵循专家小组的建议，决定对某些用于制造爆炸物的产品实施禁运，并为此已经拟定了一份执行协助说明，可供全体会员国在委员会网站上查阅。

委员会在比利时担任主席期间举行了10次非正式会议，包括视频会议，并处理了50多项通知。委员会与索马里当局举行了两次对话，更不用说经主席安排，在2020年1月1日对摩加迪沙进行的工作访问。

应当指出，由于专家小组出色的调查和分析工作，委员会对青年党的筹资能力以及如何降低此种能力越来越感兴趣。

在我们整个任务期间，专家小组和索马里联邦政府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关注的焦点。我们都为加强这种互利的工作关系作出了贡献。我希望这种合作将继续下去并更加牢固。有时候敏感问题得到处理，因此我要赞扬索马里联邦政府展示承诺，就这些问题与委员会和小组进行对话。

我想强调最后一点。“制裁制度”一词令人遗憾。应当指出，安理会并不制裁索马里，而是制裁对索马里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人——这是一个关键区别。此外，制裁制度也在演变，以适应当前的威胁。最后，该制度是支持索马里和平与安全的工具。只有所有各方彼此合作，才能改进该制度，更快地实现其目标。

最后，我想再谈两个一般性问题和一个具体问题。

第一，在整个任务期间，比利时特别重视在执行安全理事会各项制裁制度时尊重程序保障，即“正当程序”。在这方面，我们希望安理会成员能够致力于通过审查如何建立更公平更透明的程序，继续提高联合国制裁的效力。

第二，应当指出，主持一个附属机构的工作量很大，特别是对于团队较小的特派任务。因此，比利时主张在安理会当选理事国和常任理事国之间更公平地分配附属机构的主席职位。

第三，更具体地说，比利时临时担任了另一个附属机构——联合国赔偿委员会(赔偿委员会)的主席，该机构处理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战争以来伊拉克拖欠科威特的赔偿问题。它是安理会的一个附属机构，遗憾的是，它往往被忽视，因为它位于日内瓦，是一个精算性质的索赔委员会。不过我今天想提一下，因为下任主席可能会监督上述赔偿的最后一笔支付，并因此监督赔偿委员会的终止，这无疑将需要安全理事会通过一项特别决议。

最后,我谨对秘书处同事的奉献和专业精神表示感谢,他们的支持至关重要。

祝我的继任者一切顺利。我们将通过密切合作,确保我们的任务顺利过渡,并在本阶段及其后继续配合他们。

最后,我谨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比利时和其他会员国编写的联合国制裁委员会主席和成员最佳做法指南。我们希望该指南将成为未来主席及其团队的有用工具。

附件二

印度尼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钱宁以安全理事会关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1989(2011)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安全理事会第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和安全理事会第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主席先生，我感谢你组织本次通报会，让我能够以安理会三个附属机构——安全理事会关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1989(2011)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安全理事会第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和安全理事会第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介绍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两年前，我的前任哈萨克斯坦常驻代表乌马罗夫大使和玻利维亚常驻代表萨查·塞尔吉奥·略伦蒂·索利斯大使提醒我们，附属委员会经常收到会员国关于这些委员会的工作缺乏透明度、公平和问责的一些批评。我们很重视这些意见。

我在回复中努力做到坦率、透明和公平，并严格遵守这些委员会的规则和程序。我们的记录证明，我们在政治协商中作出了额外的努力，以便在达成共识方面找到共同点，沟通各种观点，确保各项制度有效运作，例如，从决定疫情大流行期间的会议安排到列出个别决定的过程等。

此外，我高兴地报告，1267委员会是第一个在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期间成功召开视频电话会议的制裁委员会。经过协商，在我们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和集体决策的基础上，在不损害我们的规则和准则的情况下，委员会成员同意举行虚拟会议，讨论与我们执行任务有关的若干问题，包括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监察员的报告，以及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及基地组织构成的全球威胁。

此外，关于1267委员会，在2019年和2020年期间，我们还成功完成了对制裁名单的审查，随时根据最新和最可靠的信息更新名单。我自豪地报告，由于会员国的持续支持和贡献，今年我们收到的答复数量创纪录。

至于1988委员会，正如安理会所知，其主要目标之一是支持阿富汗的和平与和解进程。我们不仅通过列名和除名活动，而且通过给予豁免以使名单所列人员能够参加和平与和解活动进程，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贡献。因此，现在有14名名单所列人员获得旅行豁免，可以在一系列国家参加和平谈判，直到明年1月。

我们认为，委员会的继续合作和团结是我们的重要工作进一步发展的先决条件。我赞扬委员会成员努力维护委员会的公信力和名誉。

我们需要各委员会再次团结起来，支持我们共同努力提高各制裁委员会的透明度、公平性和效力，目前我们的专家正在就此进行谈判。这将是我们的共同成就，也是各委员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关于1540委员会，我在2021年4月全面审查和延长任务期限之前的独特时刻开始担任其主席。因此，我确定了三个优先事项，即：各国增加汇报、提高认识并对进程本身进行全面审查。

我们已为这些优先事项作出额外的努力。我在几乎所有双边会议上，都提出1540相关的问题。我参加了与1540相关的战略活动，并发送视频信息，以确保各方听到与1540有关的工作情况。我们还推动就早日通过全面审查相关文件进行讨论。

[接上段]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积极的反馈。除其他外，我们将未提交报告的国家数量从11个减少到了9个，并大幅增加了各国以及国际组织提交的报告数量。在过去两年中，委员会收到了58份更新的国家报告、66份关于委员会汇总表的答复、12份关于全面审查的意见，以及联络人增加了20%。这些是委员会收到过的最高提交数量。

关于全面审查，筹备和工作从去年通过模式文件和计划的活动时开始。2019年10月，委员会与各国和国际组织举行了首次公开协商。尽管由于COVID-19的原因出现了延期和挑战，但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使新任主席以及委员会能够在2021年继续开展工作。委员会已经完成了国家执行情况汇总表的大部分更新工作，并为确保平稳过渡举行了讨论，以便向新成员提供我们的机构记忆。

关于内务管理问题，我高兴地通知大家，我们在担任主席期间推动了1540委员会专家组及其协调员甄选程序的透明进程。我还高兴地通知大家，委员会已采用精简的程序和模板，特别是处理信函的程序和模板，以提高效率，加快委员会的反应。

我必须承认COVID-19对委员会工作的影响有多大。只是简单概括一下，根据迄今为止的数据，委员会在2020年发出了489份内部说明和82封信，而2019年为760份内部说明和351封信。然而，我们保持了委员会发出的普通照会的数量——2020年626份普通照会和2019年667份普通照会。我们参加外部活动的人数也有所减少，从2019年的59人减少到2020年的19人，主要是因为大多数计划的活动被主办方取消，以及我们的专家无法出行。

然而，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来确保委员会能够履行其任务。在疫情爆发之初，我们做了一切书面工作，包括我作为委员会主席向安理会做的年度通报，以满足决议的最后期限要求。我们还举行了多次视频会议。最终，在形势允许并遵循严格的健康和安全规程的情况下，1540委员会成为2020年10月第一个举行面对面会议的附属机构。

关于提建议的问题，同我的比利时同事一样，我们也认为在担任各委员会主席方面需要公平分工。安理会所有成员，包括常任理事国，都应该担任委员会主席，分担责任和负担。这是我想强调的一个重点。我还想建议更新各委员会和附属委员会的指导方针，因为距离讨论这些指导方针已经很久，它们不再适应当前的挑战。安理会及其附属机构必须避免受到非安理会成员的批评。现在是我们更新自我的时候了；现在是我们现代化的时候了。

我谨代表我国代表团感谢协调员和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成员、监察员及其办公室成员以及1540专家组的支持与合作。我还要感谢裁军事务厅、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以及秘书处其他成员对委员会的支持。我还要感谢委员会成员，并通过他们感谢大使们。我请他们向委员会中的所有专家转达我最深切的谢意，专家们在确保委员会能够履行任务方面发挥了影响力。也请允许我以本国代表的身份，感谢所有即将离任的附属机构主席以及协调人在过去两年的领导。我也祝愿各委员会的下任主席和即将上任的成员在委员会未来工作中一切顺利。

最后, 我谨向印度尼西亚代表团中负责这些委员会的专家Rayyanul Muniah Sangadji和Haryo Budi Nugroho致敬, 他们勤奋工作, 确保我们能够以最佳方式履行主席的职责。我们总是试图达成共识, 我们总是努力确保我们履行了责任。

正如俗语所说,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谨鞠躬离任, 并希望下一任主席能做得更好。

附件三

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托夫·霍伊斯根以安全理事会第1718(2006)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身份所作的发言

两周后, 我将完成担任安全理事会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第1718(2006)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任务。

让我从警告说起。近年来, 媒体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核计划和弹道导弹计划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报道没有获得同样的公众关注, 但没有坏消息并不是好消息。自2017年以来, 我们没有看到朝鲜进行过核试验。最后一次弹道导弹发射是在春天。然而, 平壤继续建立核武库, 对其邻国构成威胁, 并可能造成毁灭性的全球后果。

弹道导弹计划继续全力进行。就在两个月前,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平壤的一次阅兵中展示了一种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弹道导弹的扩散方面, 朝鲜仍然是最危险的全球威胁。

德国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立场在我们担任安理会成员的整个期间都是坚定不移的。我们推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履行其义务, 彻底、可核查、不可逆转地摒弃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必须对平壤继续施压。

我今天的发言是联合国广大会员国和广大公众了解1718委员会和安全理事会工作的难得机会, 因为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会议传统上是闭门举行的。这样做有很好的理由, 因为闭门会议使安全理事会成员能够以更加开放和非正式的方式参与, 如果会议是公开的, 这是不可能的。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 只是因为我不希望非公开模式被推定为对朝鲜及其公然和恶劣的侵犯人权行为所构成威胁的严重性缺乏认识。

在过去两年中, 平壤应对地缘政治格局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但其意图并没有改变。没有严重挑衅并不意味着我们更接近政治解决。金正恩政府拒绝进行有意义的接触。除非这种情况改变, 否则安全理事会没有理由改变目前的制裁措施。

今天, 我想提出三个要点。首先, 我将报告委员会过去两年的工作。然后, 我将就安全理事会及其各制裁委员会处理一般事务的方式提出看法。第三, 我将谈谈对今后必须进行哪些改革来改进制裁制度的想法。

总结委员会的工作, 资产负债表显示出喜忧参半的结果。我们得以维护目前的制裁制度, 但委员会未能就制裁名单上新增的个人或实体达成共识, 尽管有充分证据表明, 某些个人和私营公司在继续规避制裁。

自2017年以来, 大量可用于非法核计划和弹道导弹计划的原材料、工业机械和其他物品仍被禁止运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鉴于只有少数国家报告在国外被当作廉价劳动力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民被遣返的情况, 我谨提醒所有会员国注意这项义务。要求会员国提交国家报告的安全理事会决议概览可在委员会网站上查阅。

精炼石油产品的进口仍然限制在每年50万桶。这个问题一直是委员会工作中的一个主要症结, 不过, 容我稍后再谈这个问题。

协助1718制裁委员会的专家小组每年印发两份报告。这些报告载有关于制裁名单上应增列什么人和什么物项的建议。例如,有广泛的证据表明,在公海上发生船对船转运汽油、柴油和其他石油产品的情况。然后,接收货物的船只驶往朝鲜一个港口,通常是南浦,卸下其非法货物。我们知道这些船只的名称、拥有这些船只的个人和公司的名号,但委员会仍有成员阻止我们采取行动。这就让人严重质疑指导各委员会工作的一项关键规则——即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决定的原则。

成员们可能已听到这样的批评,即委员会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民间苦难关心不够。事实恰恰相反。委员会竭尽全力确保被剥夺基本必需品的男女老少获得人道主义援助。自2018年年中以来,我们委员会得以批准超过75项不同的人道主义豁免,以支持广泛的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但是,正如我们从熟悉实地情况的部门,包括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那里了解到的那样,指定用于人道主义目的的货物堆积在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边界上,因为平壤以冠状病毒疫情为由不允许货物通过。因此,虽然委员会已经尽力确保援助送达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民众,但现在责任在于朝鲜政府。

在我任期即将结束时,我们简化并改进了人道主义行为体基于人道主义理由获得制裁豁免的机制。根据更新的第7号执行援助通知,委员会给予人道主义行为体更长的标准豁免期——九个月,而不是六个月——等等。这是一个小小的成果,但足以解决人道主义界的关切。

我早些时候提到的一个问题困扰了委员会两年多。自2017年12月安理会一致通过以来,限制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运送汽油、柴油、取暖油和其他精炼石油产品的规定基本上无效。第2397(2017)号决议将此类产品的运送限制在每年50万桶。所有会员国和秘书处都有责任确保不超过这一数字。有人会认为这很简单。会员国以该决议使用的计量单位——桶——报告其计划交付量。秘书处统计这些数字,并在石油上限即将达到之前通知国际社会。

但实际上,一些会员国坚持以吨而不是桶为单位报告交付量。如果它们同意让秘书处进行换算——只不过是简单的算术——那就不成问题了。然而,这些安理会成员却认定,找到一个转换率是非常复杂的。事实上,这些国家一直在回避它们认同的决议。委员会专门举行了几次会议,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甚至两次将问题提到安理会,同样我们没能找到解决办法。作为最后的努力,我邀请主要的大使来开会解决这个问题。但其中两位大使拒绝和我一起寻求解决办法。我们甚至提议使用简单的公司转换表,如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或英国石油公司的转换表,但这些提议也被拒绝。

一个60多年前将第一颗卫星送入轨道的国家和另一个刚刚在两周前庆祝登月的国家无法进行如此简单的计算,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只要有政治意愿,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我敦促我的继任者——无论是谁——继续推动这一重要事项。与执行所有其他制裁的情况一样,我们有责任推动这项工作取得成效;安理会的信誉岌岌可危。我只能告诉我的继任者,即使遭到人身攻击也不要放弃。我们作为10个当选成员被选入安全理事会,是为了捍卫国际法和联合国。我们必须采取立场,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

第二,请允许我简单谈谈安理会处理制裁问题的方式。各委员会对于确保安理会能够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面临的威胁至关重要。制裁可能并非总是得人心,但制裁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可指导各国政府和其他政治行为体

和平解决可能影响各区域内外安全的争端。主持一个制裁委员会需要毅力和决心。10个当选成员在这方面肩负着重任。我赞扬各位主席及其团队协助安全理事会工作取得成功。

两年前,我的前任1718委员会主席、荷兰大使卡雷尔·范伍斯特隆姆在临别发言时提出了责任分担问题。我同意他的观点。现在安理会非当选成员应承担其应有的责任。由一个常任理事国来担任制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委员会的主席可能并不合适,但其他制裁委员会的情况则不同。我和我的团队正在与即将上任的五个成员的代表联络,以确保不管谁是我的继任者都会在1月1日接任主席时做好准备。此刻,我要感谢我们委员会的高级秘书戴维·麦克纳布及其在安全理事会事务司的杰出团队每天都在支持我的工作。他们一直是德国代表团整个团队的好伙伴。我们感谢他们的专业精神和丰富的专门知识。

我要谈的第三点是,联合国制裁制度中什么需要改变。在安理会任职两年时间不算很长,但足以观察到存在的缺陷。

一个显而易见的缺点是专家小组成员的工作条件。这些专家在安全理事会制裁制度的运作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就薪酬、福利、旅行安排以及工作的其他方面而言,他们的待遇不及联合国长期工作人员。这需要改变。

尽管不是朝鲜制裁委员会的一分子,但我如果不提及关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相关的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号、第1989(2011)号和第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监察员的情况,那就失职了。该监察员在与先前提到的专家们相同的条件下工作。但是,他依靠别人才能开展工作,包括决定何时旅行以及在何处听取证人讲述情况,这会被视为有损其独立性。此外,按照现在的情况,存在法院拒绝在其管辖范围内执行制裁的真实风险。安理会需要加强该监察员机制,并把它作为示范,在联合国所有制裁制度中采取类似保障和补救措施。

在我们同联合国广大会员国进行接触过程中,有一点变得很明显,那就是,许多国家要么不了解安全理事会制裁规定的义务,要么感到被强加了这些义务。我谨鼓励联合国提供信息和培训,以便所有会员国都了解并能够履行其义务。

最后,我谨感谢我的团队:荷兰的莉拉·德尔科勒和德国代表团的克里斯托弗·布兰纳。得到莉拉的参与,我们很幸运,她此前曾在我的前任手下担任过类似的职务,在加入我们的团队后一直表现出色。克里斯托弗在这条道路上的每一步都支持我的工作。这条路走得不容易。

附件四

德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京特·绍特尔以关于利比亚的第1970(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作的发言

作为关于利比亚的第1970(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我愿谈三点:我们本应取得的成就、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和我们能够取得的成就。

我首先谈第一点。作为安全理事会成员,我们现在有一个独特的机会来帮助利比亚实现和平。我们都知道,安理会的最重要贡献之一是确保充分执行武器禁运。因此,作为利比亚制裁委员会主席,我利用一切机会呼吁委员会成员、安理会成员以及联合国广大会员国履行这一义务。

我们的成功很有限。尽管1月份在柏林会议上作出了承诺,而且这些承诺还被载入了第2510(2020)号决议,但直到今天,公然违反武器禁运的行为仍在发生。专家小组关于利比亚境内存在瓦格纳集团和叙利亚雇佣军以及来自土耳其或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武器的报告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今天发出的主要信息仍然是,大家必须执行武器禁运。所有外国作战人员和雇佣军都必须离开利比亚。

我要谈的第二点涉及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这一点更加脚踏实地。我们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尽管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但在若干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具体进展。监测武器禁运是我们的主要优先事项。我们组织了委员会关于武器禁运执行情况的通报会;我们鼓励专家小组经常向委员会成员通报最新情况;我们还与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接触,以便为在纽约的我们提供有关这一局势的最新情况。关于旅行禁令,我们密切监测不遵守禁令的情况,并出于人道主义原因给予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豁免。关于资产冻结,我们与会员国就一些复杂的执行问题进行了接触。

委员会非常密切地关注了一起企图非法出口石油事件,并为保护利比亚的自然资源作出了贡献。这确实起到了作用。我们启动了关于旅行禁令的执行通知的更新工作,并拟订了涵盖石油制裁的执行协助通知草案。我还启动了委员会导则更新进程,因为这些导则反映的仍是2011年制裁制度的状况。这项工作仍在进行中。我希望,我们不久将达成共识。委员会目前正在审议违反国际法和侵犯人权者的列名之事。如果批准此事,那将是2018年以来委员会首次制裁个人。在这方面,我也仍然希望安理会能够达成共识。

作为主席,我就制裁措施的执行问题召开了两次制裁委员会会议,该区域若干会员国和区域组织参加了会议。去年,我们还与两个其他制裁委员会就一些贯穿各领域的问题举行了一次联席会议,并两次与利比亚投资局接触,讨论资产冻结措施的执行工作。

德国还以利比亚制裁问题共同执笔者的身份作出了贡献。

我要谈的第三也是最后一点涉及我们能够取得的成就。在这方面,请允许我略微谈几点笼统意见。我要谈的第一点意见涉及外联活动。要使产生的效果不只是发出政治信息,就需要使制裁得到执行。联合国会员国的执行情况千差万别——一些地方严格执行,另一些地方没有执行。因此,就制裁的执行问题开展外联活动必须成为委员会工作的一个关键部分,才能协助那些愿意但没有能力执行的国家以及鼓励那些有能力但不愿意执行的国家执行制裁。在同广大会员国接触方面,我们尚未充分发掘潜力。我认为安理会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共识,这是好消息。

我要谈的第二点意见涉及透明度。制裁总是涉及政治问题。点名羞辱是任何一套制裁都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此，保持透明度至关重要。这必须包括关于违反安全理事会所规定的制裁行为的透明度。与其他制裁制度情况不同，利比亚制裁委员会的议事规则没有规定利比亚问题制裁专家小组的所有报告都应公布。委员会所有成员都应鼓起勇气纠正这一情况。

我要谈的第三点意见涉及决策。与委员会内各位同事的合作一直非常好。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委员会未能履行自己的职责。我认为，造成这一局面的一个关键原因是，所有决定都只能以全体一致方式作出。如果至少在程序性问题上能够适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办法，委员会的工作就会大幅增加。

我要谈的第四点意见涉及连贯性。秘书处和1970委员会专家小组正在开展出色的工作。然而，联合国处理制裁问题的机构设置完全不妥。安全理事会需要就制裁问题设立单一秘书处，负责所有制裁制度。

[接上段]这比有关制裁执行的外联工作更重要。至关重要的是，要确保为落实安全理事会所实施的制裁的后续行动是有效、高效、连贯和专业的。

我要就人道主义方面说几句。我们在安全理事会就制裁的人道主义影响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有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制裁委员会必须确保迅速和可靠地给予现有的人道主义豁免。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安理会在制裁问题上的合法性就会受到损害。因此，委员会在这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是一个好消息。在这个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的时代，这一点尤为重要。

我最后要谈的是责任。作为安全理事会成员，我们都有责任吸取这些教训。我们都知道这不是技术问题。这意味着，即使有时可能会很痛苦，我们也需要一次又一次地就这些问题进行严肃的辩论。我坚信，引发这种辩论——即使是令人痛苦的辩论——也是主席的一项重要责任。

最后，我谨代表我本人以及我的前任于尔根·舒尔茨大使和我的团队，借此机会感谢专家小组的出色工作。专家小组需要能够指靠会员国的合作。在一名委员会前成员被捕后，我不断强调会员国必须尊重特派专家的特权和豁免。

我也要感谢Sana Khan女士和她在安全理事会事务司的团队给予的大力支持。特别感谢来自德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Tiffany Jenkins女士和Agapi Nehring女士，我们的两位利比亚制裁专家。她们是最棒的。

尽管目前我的继任者尚未确定，但我愿向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保证，我将支持任务的顺利交接。

附件五

多米尼加共和国驻安全理事会特使何塞·辛格·魏辛格以安全理事会关于马里的第2374(201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身份所作的发言

[原件: 西班牙文]

我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兼安全理事会关于马里的第2374(201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副主席南非允许我分享我在担任2374(2017)委员会主席期间的一些经验, 希望这将为新任主席和其他人提供相关信息和指导。

首先, 我要适当感谢安全理事会事务司为支持2374(2017)委员会主席和成员开展重要工作, 使委员会在程序性和实质性方面, 包括后勤事项, 以及在需要新成员和专家上岗的过渡进程中能够高效开展工作, 执行第2374(2017)号决议。

此外, 我们充分认可专家小组在支持委员会执行第2374(2017)号决议规定的任务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主要是向委员会提供有关信息, 以根据既定标准任命可能的人、执行商定措施以及更新制裁名单上的人员。

在这方面, 我谨强调支持专家小组协助委员会完成其任务的重要性, 我们指的是给予他们客观分析所收集信息必需的独立性, 以便委员会获取各种关键背景知识, 使其能够更好地完成分配给它的任务。

在指导委员会的工作时, 多米尼加共和国侧重于充分有效地执行其基本任务, 强调透明度、促进对话以及相关和包容性的参与、独立和客观的分析以及适当处理敏感信息。毫无疑问, 委员会在这些和其他领域的工作能够而且应该得到进一步改进。

关于提高透明度的问题, 有关会员国, 特别是该区域各国参加委员会的某些非正式会议, 将有助于建立信任, 更好地理解和支持制裁制度, 使其更加明确, 并鼓励遵守其义务, 同时向委员会提供额外信息, 保证最高水平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此外, 委员会主席对马里和该区域的访问——就我而言, 是2019年10月16日至18日——提供了一个与主要行为体举行会议并从主要来源获得相关信息的绝佳机会, 这也是工作方案中应优先考虑的一个机会, 从而提高对制裁的认识, 包括对列名和除名进程的认识。

不幸的是,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影响了包括委员会在内的所有领域的工作方式, 尽管应研究在这种方式下协调短期至中期访问的可能性, 但目前疫情使得面对面会议只能以虚拟形式进行, 并要求在条件允许之前推迟对该区域的访问。另一个重要挑战是去年8月马里政变的影响, 这一事件正在破坏宪法秩序, 而且发生在向恢复民主过渡的过程中, 有可能拖延《和平与和解协议》在马里的执行, 并侵蚀迄今取得的成就。

最后, 我要感谢委员会所有成员以及联合国相关机构, 包括联合国马里多层次综合稳定团的领导层, 感谢他们在我任职期间所做的出色工作和给予的支持, 这如实地表明了我们每个人对促进该国和平、安全和持久稳定的承诺。

附件六

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杰里·马特基拉以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特设工作组主席身份所作的发言

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特设工作组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一个重要附属机构。作为主席，我向安理会通报特设工作组的工作，特别是工作组在2019年和2020年开展的活动。由于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的负面影响，2020年活动期间缩短。

关于特设工作组2019年的活动，其第一次实质性会议于2019年5月29日举行，会议重点是非洲冲突的根源问题，特别是在自然资源的非法开采和贸易成为冲突主要驱动因素的情况下，预防冲突以及冲突管理和解决有哪些选择。侧重于这一主题的理由是，非洲的许多冲突是由自然资源非法贸易的激增助长的，对区域稳定具有巨大影响，可以说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也具有巨大影响。

许多研究，包括联合国的研究，都探讨了非法开采非洲自然资源及其贸易之间的直接关联。人们公认，这种关联也是非洲大陆大多数棘手冲突的主要根源和肇因之一。通报者和与会者，包括来自会员国、学术界、联合国系统及民间社会的代表，都提出了重要的政策建议和相关提议。

特设工作组第二次会议于2019年6月21日举行，重点讨论安全部门改革议题，特别是当地参与和主导改革努力的作用。侧重于这一议题的理由基于如下理解，即联合国和非洲联盟(非盟)可利用其相对优势，确保各自发挥关键作用，支持与安全部门改革相关的卓有成效冲突分析。

安全部门改革中的包容观至关重要；消除安全部队和当地社区之间缺失信任的现象也是如此。因此，必须制定促进民众和安全机构之间交好的对话机制，并确保民众参与安全部门改革进程的设计和实施。要成功和卓有成效地推行安全部门改革，当地就必须拥有自主权，这已成为当今主要现实的组成部分。

特设工作组于2019年8月9日召开了第三次会议，审议安全理事会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第十三次年度联合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安全理事会和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成员亟须就影响非洲大陆的共同问题交换看法，包括制定预防和解决冲突的联合建议和共同办法，以便重点解决非洲大陆的长期冲突，这凸显出本次会议的重要性。

按照惯例，两个理事会决定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两次会议，第一天，即2019年10月23日，专门用于举行第四次非正式研讨会，会上讨论了两个议题：首先，平息非洲的枪炮声；其次，在非洲大陆执行任务的方式。第二天，即2019年10月24日，专门用于举行第十三次年度联合协商会议，重点讨论利比亚局势、南苏丹局势以及《中非共和国和平与和解政治协议》的执行情况。

最后，特设工作组还于2019年10月2日和4日举行了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专家委员会和安全理事会所属专家之间的重要联合工作会议。这次联席会议是在第三次研讨会期间举行的，重点讨论到2020年平息非洲的枪炮声、预防冲突和调解、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反恐、气候变化以及支持非盟和平行动等问题。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专家委员会和安全理事会专家之间的这些交流确保我们向非盟专家介绍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方法，并使其熟悉这些方法，这对于加强两个理事会在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合作与伙伴关系至关重要。

关于特设工作组2020年的活动,已经依照其任务授权按计划举行了若干次会议,以审议重要议题。然而,特设工作组的活动未能幸免于COVID-19大流行的负面影响,这迫使其中一些计划被取消。尽管如此,特设工作组确实召开了一次虚拟但重要的会议,以筹备安全理事会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第十四次年度联合协商会议。其后,安全理事会和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成员于2020年9月29日和30日在一个虚拟平台上举行了其第十四次年度联合协商会议。按照以往惯例,安全理事会和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成员讨论了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

在2020年9月29日举行的第五次联合非正式研讨会上,两个理事会的成员交换了意见,探讨如何加强成立75周年的联合国和成立57周年的非洲联盟之间的合作。两个理事会的成员还思考了平息枪炮声这一突出议题,特别是如何创造有利于非洲发展的条件。

在2020年9月30日举行的第十四次联合协商会议上,安全理事会和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成员思考了两个议题,即索马里的局势以及马里和萨赫勒区域的局势。本次会议结束时,两个理事会通过了一份公报,以示纪念。

最后,特设工作组的任务授权非常具体,即发挥关键作用,在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的做法上向安全理事会提供协助和咨询。此外,特设工作组为参与和讨论棘手问题提供了一个平台。此外,它为安理会公开、透明和非对抗地审议重要的和平与安全事项提供了机会。

南非在担任特设工作组主席期间,力图确保安全理事会当选成员和常任理事国在执行集体任务时提出独特和创新性的办法,推动预防和解决非洲的冲突。

我要感谢各代表团在我担任主席期间支持和积极参与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特设工作组的工作和活动。我希望,我们的继任者将再接再厉,推进这项扎实工作以及安全理事会与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良好合作。

我谨借此机会感谢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的法蒂玛·穆罕默德大使及其团队、主管非洲事务助理秘书长宾图·凯塔女士及其团队、非洲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的比恩斯·加瓦纳斯女士及其继任者克里斯蒂娜·杜阿尔特女士。我也感谢联合国秘书处的支持。我还要感谢埃塞俄比亚和苏丹两国政府为安全理事会2019年访问亚的斯亚贝巴和南苏丹的朱巴提供便利。

我也感谢2019年安全理事会的三个非洲成员国,即南非、科特迪瓦和赤道几内亚,以及由安理会的三个非洲成员国,即南非、尼日尔和突尼斯以及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组成的2020年组合,在非洲问题上,这些国家给予支持和坚定不移的声援。我还要感谢由常驻副代表克索利萨·姆芬迪索·马布洪霍大使、政治协调员马蒂纳斯·范·斯卡尔奎克先生和副政治协调员卡加格洛·塞米娜·莫加绍阿女士率领的南非团队。